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兼论与马克思学说的相互关联

郑召利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本书出版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兼论与马克思学说的相互关联

郑召利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兼论与马克思学说的
相互关联 / 郑召利著.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6

ISBN 7-309-03176-8

I. 哈… II. 郑… III. 人间交往—理论研究
IV. 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0591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875

字数 204 千

版次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200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 500

定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哈贝马斯是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知识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毕生致力于交往行为理论的构建，试图为“病理性”的现代社会提供正常的社会评价标准，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奠定理性基础。

本书以交往行为理论为主线，阐述哈贝马斯如何对批判理论进行基础重建。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进行深刻反思，通过创建普遍语用学，论证了交往行为的规范基础，从而完成了批判理论由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型转换。

哈贝马斯以“系统—生活世界”的理论架构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认为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理性并未完全泯灭，在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中蕴藏着巨大的理性潜力。然而，由于金钱和权力不断地向生活世界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侵蚀，致使现代社会陷入交往困境。只有倡导和张扬交往理性才能拯救现代性的理想。

本书还通过对哈贝马斯关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揭示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交往理论之间的深刻关联。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重要资源，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则为丰富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功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

序

金顺尧

郑召利副教授的博士论文《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兼论与马克思学说的相互关联》，经过同行专家的仔细评审和答辩委员会的认真答辩，获得了一致好评，顺利通过。又经过有关专家和领导部门的评审，获得了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这表明他的论文在学术水平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肯定，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我为他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并应他的要求，为他的论文出版作序。在此，我想就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如何看待现代西方哲学的问题谈点感想。

感想之一。郑召利的论文启示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要积极关注和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以往，在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似乎存在着一种观念：我们只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关心实践提出的问题就行了，不需要太多地关注和研究西方哲学问题。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不仅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一方面西方哲学源远流长，是个极其丰富的思想库。特别是现当代的西方哲学，虽属资

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它毕竟是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必然要反映人类在现阶段上的认识成果，体现人类在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等各门具体科学在现阶段所取得的进步。比如，他们利用现代生理学、心理学的发展，从微观角度对人类的认识机制作出仔细的分析；利用语言学和逻辑学的发展成果，对人的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进行有益探索；总结科学史和现代科学成果，对科学和认识发展的规律进行研究，等等。这些是西方古典哲学远远不及的，是可供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吸取的思想资料。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关注现代西方哲学的理由还在于：它与现代西方哲学形成于同一历史时代，具有大体一致的历史条件和科学与认识发展的背景，因而所关注的问题有不少是共同的或相近的，所运用的思想资料也大体是相同的，它们两者在许多问题上相互渗透的。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可以批判地借鉴现代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某些有价值的成果，为我所用。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就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既然如此，当今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应改变过去那种不关注或很少关注现代西方哲学而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做法，要开阔视野，拓宽研究领域，关注现当代西方哲学领域重大问题的讨论，积极参与。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感想之二。郑召利的论文还启示我们：在关注现代西方哲学时，应首先是那些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紧密相关的流派和问题。这是因为现代西方哲学有各种各样的流派，内容极其广泛而又丰富。就我们研究涉及的可能性范围而言，既可以对现代

西方哲学提出的带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也可以对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学派的哲学家作较深入的探索,从中借鉴或批判地吸取某些对我们有价值的思想资料,或研究方法等。在当今,我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值得我们用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和研究的流派之一。尽管该学派内部各自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都秉承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然而他们又认为:马克思主义现正面临着危机,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对它重新评价和阐释,只有把它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相结合,才能使其获得新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错误看法,我们当然是不能同意的。但是,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各种批评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评价与阐释中,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问题,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因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具有直接现实意义。

感想之三。郑召利的论文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直接对话,进行比较研究的问题。论文通过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和马克思的交往理论的比较分析,力图揭示两者之间的历史关联。在此之前,国内学者研究哈贝马斯哲学理论,虽然出版过几本专著,但都处在对他的整个理论体系或某个构成部分的梳理和评论的水平,较少进行对话和比较的研究。郑召利的论文往前推进一步,抓住了哈贝马斯理论体系中交往行为这个核心问题,进行评析,揭示它的内在逻辑和发展形态,阐明他如何重建批判理论,怎样用交往行为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病理学”的分析,并廓清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与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历史关联,力求在分析中挖掘出交往行为理论中有价值的可资借鉴的东西,以深化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我以为,论文所展开的对话和比较研究,做得相当出色,在国内哈贝马斯哲学研究上是一个突破性推进。此前,国内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很少关注哈贝马斯的理论,即使涉及了,也没有把两者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表现出不应有的漠视;而研究西方哲学的人在论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时,也很少论及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即使论及了,也往往缺少深度挖掘,而依然是从意识哲学角度去理解马克思,因而对哈贝马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性“重建”,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交锋。而郑召利的论文在这方面的努力颇得同行专家们的好评,认为论文“抓住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这个核心问题,对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作集中系统的分析研究,作出了新的理解和诠释,这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都是很有意义的”。因此,和现代西方哲学对话,进行比较研究,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好形式。

另外,还值得提出的是郑召利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表现出对待理论问题的严肃认真和求实创新的学风。我记得,他在入学不久,就提出要研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后就围绕这个方向认真地搜集资料,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原著,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复地钻研,并参考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推敲,力求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哈贝马斯的本义,在作评论时力求得当有分寸;在自己作理论发挥时力求言之有据。这种学风和精神体现在他三年的研习过程中,也体现在论文的字里行间。因此,得到了同行专家们的好评。我希望他在今后的

序

理论研究中继续保持这种良好的学风,在学术上取得新的成绩,也希望后面的年轻学人能学习和发扬这种学风。

仅以此为序。

2002年3月30日于复旦大学

前 言

哈贝马斯堪称是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知识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积极倡导将哲学和社会学理论转变为一种人们可以广义地称之为理性重建的理论，即一种具有自我反思性、能够提出批判尺度的社会理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著名代表，他毕生致力于交往行为理论的构建，试图为“病理性”的现代社会提供正常的社会评价标准，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奠定理性基础。哈贝马斯在批判理论重建方面所作的努力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哈贝马斯就已崭露头角。他抱着浓厚的政治兴趣，开展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在学术界展现了不凡的理论才智。但由于种种学术政治的原因，其影响所及的范围并不大。只是到了 80 年代初，他的两卷本巨著《交往行为理论》(1981)问世，他作为哲学家、社会理论家的地位才得以确立；进入 90 年代，哈贝马斯对民主、政治问题高度敏感，著书立说。直至今日，仍笔耕不辍，其在西方的影响如日中天。哈贝马斯思想在我国的传播，随着大量译著的出版，引起了强烈反响。仅 1999 年哈贝马斯的三部主要著作由一家出版社同时推出，就证

明了这一点^①。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的学术地位刚刚确立的时候,就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除了引介哈贝马斯的学术观点,还陆续出版了一些研究著作。尤其近几年,哈贝马斯研究呈方兴未艾之势。

从国内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大致有三种研究路径:一是以哈贝马斯庞大理论体系为对象进行梳理、评析,勾勒其整个学术历程和理论基本脉络,以做全景式概览,如欧力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和艾四林《哈贝马斯》(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二是对哈贝马斯理论的各个构成部分的研究。譬如,社会批判理论传统及其方法论基础、言语行为理论与批判的解释学、社会合理化与国家的合法化、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商谈伦理学,等等。薛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陈学明《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和曹卫东《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属于此类;三是以现代学术界最为关注的“现代”和“后现代”辩论为背景,研究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并以此为主线揭示交往理性的现代意义。张博树的《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和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颇有新意的研究。

^① 1989、1994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哈贝马斯的名著《交往与社会进化》和《交往行动理论》。1999年由学林出版社同时推出了哈贝马斯早期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认识与兴趣》、《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三种。

由于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广泛涉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且体系大、内容杂,枝蔓繁多、用语晦涩;加之文化背景不同,“西学”难以译,因而对哈贝马斯著作的真正义理的翻译和解读,很难搔到痒处。近几年,莘莘学子搔痒日勤,趋之者渐多,不断有新著推出。但从整体上说,我国学界对哈贝马斯的研究,仍然处在梳理、阐发的水平。本书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搔痒”的工作。所不同的是:(1)本研究专注于交往行为理论这一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核心内容,以此为主线,揭示和勾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内在发展逻辑和整体形态;(2)阐释哈贝马斯如何重建批判理论,怎样用交往行为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病理学”分析;(3)廓清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历史关联。力求在“对话”情境中,挖掘交往行为理论中有价值的可资借鉴的内容,以深化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

应当指出的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哲学界对实践与主体性研究的深入,交往问题备受关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突破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传统认识^①。但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交往”这一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哲学课题上,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交往理论,尤其是对在一领域有颇多建树的哈贝马斯及其理论,少有涉猎,表现出不应有的漠视、冷淡。而对哈贝马斯情有独钟的专攻西方哲学的学者,论及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交往理论历史关联的也不多,即使有,也很浅显,或者没有从存在

^① 参见拙文《90年代以来我国交往理论研究概述》,《哲学动态》1999年第4期,第9—12页。

论层面阐发和提升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现代意蕴,依然局限于意识哲学角度理解马克思,所以,对于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性“重建”,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交锋”。

本书研究的选题,试图弥补上述之不足。当然,先要“倾听”哈贝马斯的“意见”,而后与之交流、对话。从这一意愿出发,研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至少有以下意义:(1)通过哈贝马斯研究可以了解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形态和理论走向;(2)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参照,在现代哲学语境下,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的内在贯通点,加强两者之间的对话,有助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哈贝马斯对现代西方社会交往困境的深刻洞见和理性分析,为我们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功能,提供了极具启发意义的思想材料。

下面拟就哈贝马斯理论中引入的几个关键性范畴作简要阐述,以说明交往行为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大致轮廓。

(一) 合理性、工具理性^①

批判理论重建表明了哈贝马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所持有的反思态度。它体现着

^① “合理性”(rationality)又译作“理性”,二者可互换、通用。韦伯所谓“合理性”(理性)相当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理智”即知性概念。本文中“工具合理性”与“工具理性”同义、“交往合理性”与“交往理性”相通,只是在上下文需要时,才采用不同的表述。

哈贝马斯实现批判理论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为批判理论寻求规范基础的努力和成就。

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的动机,主要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陷入困境的深刻反省引发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出发点,是在卢卡奇“物化”思想影响下,在改造马克斯·韦伯关于合理性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因此,“合理性”是理解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概念。

“合理性”概念,从根本上说,是从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人以自己的活动和行为确证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和地位。在韦伯看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可以理解为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的进程。他把社会行为分为合理性的与非合理性的两大类,而合理性行为又分为目的—工具合理性行为和价值合理性行为。所谓目的—工具合理性行为是指能够以数学形式进行量化和预测后果以实现目的的行为,它以合理地选择达到目的所采用的最有效的手段、工具以及合理地权衡确立行为的目的为特征。所谓价值合理性行为,则是指行为者在采取行为或选择时,不以成败得失和功用效益为取舍准则,而只关注如何履行某种道德上或宗教上、政治上的义务责任,服从道德良心的感召。

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主要表现为由价值理性为主向工具理性为主的社会的异变过程。他用理性二分的思想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及前景,揭示了由工具理性所导致的异化现象。工具理性的膨胀虽可造就经济的飞速发展,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道德的滑坡、价值的衰微,人成为经济机器的附属物等异化现象。对工具理性的

片面追求导致了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而这一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克服的。由此，韦伯对现代文明的前途感到无奈与迷茫，乃至悲观失望。哈贝马斯认为，韦伯之所以没有解决合理性问题面临的二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将“目的—工具合理性”与合理性一般等同起来，仅仅从“目的合理性”的单一维度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化过程，导致他用来剖析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概念过于狭窄，因而，不可能全面地把握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的真谛。

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把近代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及社会合理化联系起来，试图克服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非理性现象。他们一针见血指出，理性的工具化使得启蒙精神的理性主义走向自己的反面，即理性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在哈贝马斯看来，虽然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等人深刻地剖析了工具理性给西方社会带来的种种矛盾和异化现象，但所产生广泛影响的主要是“一种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文化批判”。他们的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针对理性本身的彻底批判，瓦解了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他们把理性同压抑等同起来，把合理性与“工具理性”等同起来，始终未能跳出意识哲学的窠臼。

(二) 交往行为、交往合理性

哈贝马斯不同意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理性概念和社会合理化进程的笼统批判，他借鉴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从合理性概念中挖掘出交往合理性。哈贝马斯从理论社会学角度把

社会行为划分为“目的论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在他看来,交往行为则是主体间通过语言的交流,求得相互理解、共同合作的行为,它按照必须遵循的有效的规范来进行。交往合理性就是要寻找交往行为的合理根据,而这种合理性根据不能到物的世界去寻找,必须到人的世界来发现。因此,交往合理性的根据就是交往主体之间相互同意、普遍赞同而且自觉遵守的规范。这就是哈贝马斯反复论证的交往行为必须遵循的三个有效性要求:即判断、陈述的真实性,遵循规范的正当性和表达自我的真诚性。他认为,只有交往行为才能把语言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功能、在遵守社会规范中的协调功能、以及在传达情感和展示自我中的表达功能统一起来,并把语言作为达至理解和共识的中介,从而提供合理性诸方面的统一性。

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实质上是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对话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调整、共同规范的认可和维护是通过商谈来进行的。要实现这一点,首要的是建立起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必须承认和重视社会中存在的共同的规范标准,因为这些规范标准影响和约束着每个人的行为,它们是社会关系能够不受干扰和破坏而得以维持的前提。就这样,哈贝马斯通过商谈伦理学的建构,完成了交往理性的论证过程,既把理论层面的交往理性扩展到实践层面的交往理性,又将商谈伦理学作为交往行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此一道构成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

交往合理性的核心是让行为主体之间进行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诚实的交往与对话,在相互承认基础上达到“谅解”与合作。

这里涉及到交往行为的理想境况问题,也就是说,要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至关重要的是要达到“社会合理化”。哈贝马斯的思路又把人们的视线引向“生活世界”。

(三) 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这一概念是“交往行为”概念完备化的不可缺少的补充概念,因为“交往行为”植根于“生活世界”之中。哈贝马斯理解的“生活世界”既是主体之间进行交往活动的背景,又是作为交往行为者相互理解的“信念的储蓄库”。它作为每一个交往活动的参与者必须置身于此的境域,提供了前人积累下来的知识和意义的资源,是预设的无争议的背景性信念。正是在这种可信赖的、熟悉的背景中,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才是可能的,正是这种相互理解在维系着社会行为或交往行为。生活世界所包含的文化、社会和个人三种结构要素与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个体社会化的过程相一致,并构成了社会符号意义层面,由此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更新。生活世界的结构转变及其再生产的过程,表明生活世界愈来愈朝向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看,生活世界不断合理化即理性化的过程,必然发展出现代人对自己作理性批判的能力,并由此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和真诚沟通,达至理想的交往境域。然而,现代社会却陷入了一方面是科技理性昌明而另一方面是人际关系疏离的困境。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和老一辈法兰克福理论家们之所以未能把握到现代社会的真谛,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缺